

画家的藏画：谁是谁的热爱？（下）

◆ 曾焱

多变的马蒂斯

不止一部回忆录里提到毕加索和马蒂斯在1910年后逐渐失和，但在展览的马蒂斯藏画中，我们却看到不止一幅毕加索作为私人礼物的馈赠。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是对手、目标，也还是朋友。

1941年，巴黎“二战”沦陷期，移居法国南部尼斯的马蒂斯将自己一幅素描送给身在巴黎的毕加索，致谢老毕帮他照护滞留巴黎城中银行金库的财产。一年后，作为回赠，出手大方的老毕把自己两幅立体主义肖像作品《多拉·马尔》送给了老马。这两幅画被马蒂斯挂在他租住的尼斯雷吉纳旅馆的房间里，和那段时间他拥有的塞尚、德加和库尔贝画作在一起。

马蒂斯的收藏习惯和弗洛伊德、德加不太一样。他的眼光和趣味总在变化，并在自己进入新的风格变化时寻求不同的画作，所以他的收藏数量很小，并极少长久保存藏品。他频繁和经销商交易，就算曾经不计代价得来的画作，如果为了买进他更喜欢的新东西，或者仅仅为了获利变现，他也舍得出手卖掉。展览中有一幅从私人藏家中借展来的高更——《耳后戴花的年轻男子》，是马蒂斯1900年从巴黎著名画商沃拉尔手中买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足够的钱，为此不惜分期付款，据说还典当了送给妻子的结婚戒指。高更此作画幅很小，画的是他1891年第一次去到塔希提岛时认识的一个土著朋友：年轻男子面目英俊而单纯，在耳后别了一朵白色栀子花，和他的褐色皮肤、粉红衬衫和黑色领结，以及后面的蓝色背景形成丰富层次。马蒂斯看到这幅画时，被它的色彩和线条迷住了。他那一时期的绘画也从中受到影响。但到了1908年，他便准备出让当年千方百计得来的这幅画，试图用它去交换雷诺阿的一幅慵懒的女人像。到1915年，他终于卖掉了这幅高更画作。

另一个故事是1899年，当马蒂斯在沃拉尔的画廊里第一次看到塞尚的《三浴女》，他立刻对自己刚付钱买下的凡·高那幅《阿利斯康墓地》兴味索然。

刚搬到尼斯的时候，他手头窘迫，但仍然倾囊而出，200法郎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而当时这是他和妻子一个月的全部生活开销。当然，这幅画后来也被出售了。

德加的《梳发》是马蒂斯保藏时间较长的一幅。这件作品本身也有点传奇性。1918年，伦敦国家画廊曾经从巴黎那场德加拍卖专场买下了这幅画，后来觉得画质粗糙，又从馆藏中清理出去了。马蒂斯很快从经纪商手中买到这幅画，一直收藏到1936年，才通过儿子皮埃尔在纽约开的画廊转手出去。有意思的是，买它的下家仍然是伦敦国家画廊，时任馆长克拉克亲自选中了它。

马蒂斯在拥有这幅画的16年里，从来没有谈论过它，但伦敦国家画廊的专家认为，马蒂斯二三十年代的室内画不排除受到德加这幅画作影响，比如对织物的描摹，对橙色和红色在画面中的大胆使用。他们展示了一幅从伦敦泰特美术馆借来的《漫不经心的阅读者》，是马蒂斯1919年的作品。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买了德加的《梳发》。

当然，没有任何一幅藏画可以比得上塞尚的《三浴女》在马蒂斯心中的位置。它对马蒂斯的艺术带来了本质的改变，让他学会“像雕塑一样绘画”，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一生。1936年的时候，马蒂斯说：“37年来我一直拥有这幅画……我从中找到了我的信仰，也获取了韧性。”

画家的“粉丝”情结

展览中有幅安格尔的油画《鲁杰罗拯救安吉利卡》，是德加最心爱之物。画题取自16世纪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名篇中英雄屠龙救美的情节，安格尔以此在1819年为卢浮宫画了一幅大画，但也许是这个宏阔



■ 马蒂斯收藏的德加作品《梳发》

场面的文学题材同时可以让他展示在绘画女性裸体方面的卓绝，后来他接连又画过几幅同题。德加拥有过的这幅，曾经属于安格尔密友弗雷德里克·雷塞的私藏，此人做过卢浮宫素描馆和绘画馆负责人，是名望极高的一位学者，去世后收藏被拍卖，德加不计代价地拍得了这幅久慕的画作。出于对安格尔和这个画题的景慕，德加后来又设法购藏了一幅构图完全相同的安格尔素描，现在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在艺术史上，德加的舞女被认为和安格尔伟大的素描有一种承接关系，看来也是有据可循。

对德拉克罗瓦的画，德加同样狂热地渴望拥有。德拉克罗瓦年少成名后，几乎就直接站在了以学院派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和安格尔各拥一个独立展厅，有点像是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撞。

而德加却偏偏同时是他们两个人的“死忠粉”。他开始收藏时，两位大师都还在世，他几乎利用一切人脉去寻找购藏两人作品的机会。他一生购藏的德拉克罗瓦作品仅油画就有15幅之多，更不用说其他色粉、素描和稿图。用自己三幅色粉画换得的

唐山抗震救灾亲历记

游玉云



7.带病救人

这时，几个观赛的老乡对我们说：“解放军真厉害，连这个60多岁的老头都像20多岁的小伙，带球跑步投篮这么爽快！够劲！”我们听了哈哈大笑，教练员刚30岁出头，咋被老乡看得那么老了呢？看来他太老气横秋了。现在唐山灾区，那活蹦乱跳的年轻“老头”，陡然苍老了许多，我们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怜悯之意。

唐山兵刘文华指挥炮车调转方向出发了。地震前，唐山是一座以煤炭、钢铁、电力、水泥、陶瓷、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城市，街道整齐，市容美观，作为一个唐山人，在自己家园找个地方不费吹灰之力。然而，现在一片废墟，又是黑夜，再加上三年未回来探亲，这个路不好带，刘文华指挥炮车一直向前开，自以为是朝正西方的机场开了，其实是朝西南方的火车站开去了。

当一条铁道横在车前时，刘文华直摇头：“不对，这好像是火车站，快掉头往西北方向开！”教练员一听此话，腹部疼得更加厉害，但他面带笑容，不介意地说：“没关系，地震把方向震错了！”就在这时，有人奔过来喊：“可把你们盼来了，解放军同志！快，有人压在车站大楼下还在叫唤呢！”

刘文华和驾驶班长正要向来人解释，教练员浑身一振：“快过去！救人要紧！”他们跳上残墙断壁，赶到车站旁一座倒塌的平房前，听到底下有人哑声喊：“救命啊！救命！”但难以辨出呼救者的方位。他们围着平房上下转来转去：“你人在哪儿？快回答！”“我就在你们脚下！”有人急呼。教练员命令：“快！在这下面！”驾驶班长在一块水泥板下找到一个洞口，急忙推开水泥板，首先钻进去，刘文华跟着钻了进去。

一盏未砸灭的铁路信号灯发出微弱之光，一位50岁左右的男人被粗大的房顶木梁压住脚，无法脱身。驾驶班长和刘文华一起奋力将房梁扛起，但下面的人伤势太重，不能动

弹，驾驶班长就以双肩顶住房梁，催促刘文华：“快，背他出去！”刘文华背起那人爬出了洞口。

腾起的灰尘慢慢飘落，教练员见首战告捷，夸奖两位战士。突然，一位铁路工人跺脚喊：“解放军同志，我们那儿还埋着一个活人，快帮俺想想办法吧！”教练员忘了自己的病痛：“在哪儿？我们现在就去！”三人跟着铁路工人，沿着铁道来到一座不成形的土包旁。

“上！”教练员一声令下，三人冲上去拼命扒挖砖块。十多分钟，三人以流血的双手扒出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坑。“咯噔”一声，余震闪过，齐腰深的坑变了形，乱砖中露出了房顶水泥板，“快救救我”的喊声就在此地。

教练员跳进坑，命令两名战士搬开水泥板，战士拼命搬水泥板，水泥板纹丝不动，怎么办？那位铁路工人从附近的单位里拿来一把24磅大锤和一把钢钎：“凿开水泥板！”战士们一致赞同。刘文华以手指滴血的双手握紧钢钎，驾驶班长举起铁锤，教练员指明凿眼点，打！24磅大铁锤甩了下来。不知是力不从心，还是初干这“苦力”的活，铁锤砸偏了，打在了刘文华的左手背上。“啊哇！”刘文华痛叫一声，左手冒出了汩汩的血，脸上青筋突暴。教练员和铁路工人见状脸色陡变。驾驶班长扔开铁锤，抓住那血手：“刘文华！我失手了！”

“刘文华，快去包扎！我来扶钎！”教练员推开刘文华，一把抓住沾有血迹的钢钎：“快打！不要手软！”铁路工人也不示弱，要替换扶钎或打锤。教练员一口拒绝：“不行！我们战士如果失手于老百姓，那就是罪过。请您千万别跟咱开玩笑。”

驾驶班长重新抓起铁锤柄，双手哆嗦，生怕再失手。教练员火了：“看你这窝囊相！快打呀，救人要紧，不要手软！”驾驶班长被迫挥起铁锤打了下去。一锤、二锤、三锤……鲜血顺着指甲脱落的手指渗到了铁锤柄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厚厚的一层水泥板终于凿穿了，驾驶班长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刘文华带着左手伤痛抢在铁路工人之前一步钻进脸盆大的洞口里，右手托起下面的工人往洞口推，铁路工人在外面拉。由于这位幸存者身宽体胖，洞口略显狭窄，因而初次抢救没有成功。嗨！真急煞人呐！

3.共产国际的指示

程世才在建国后回忆道，那时，哪里知道，这次渡河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的革命叛徒张国焘假传了中央命令，致使两万多名红军将士几乎全部葬送在这西北高原上！

两个月以前（指1936年8月，西路军渡黄河是1936年10月24-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但是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会宁会议以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假借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当时我们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到黄河边上开来了。

张国焘错误路线与西路军失败，几十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但西路军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就牵涉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关系。

1935年，当红军三大主力正在长征，北上抗日，准备在西北地区发展，以靠近苏联时，中共中央派陈云在长征途中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的意图与前进方向，这就使共产国际及时地了解了红军的动态，并藉此对中国的当下形势作出判断。同时，随着“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共双方均预感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可避免。于是，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考虑，中共在对敌政策上作出了新的调整。

1935年间，王明在莫斯科发表了《中共的新政策》《为争取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等文章，表达了中共改变以往政策，谋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愿。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1935年7-8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一主张强调，中共将准备联合中国“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社会主义派”，包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一切已经用武器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的

民族解放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们压迫的民族”。代表团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和一切反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共同组织全国统一的人民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接着，1935年10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自己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了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等文件刊出之时，恰好发生在中央红军经过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落下脚来的前后。面对陕北地贫人稀、苏区面积极为有限、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严重困难的客观现实，继续坚持以往的工农革命的方针和排斥一切中间势力的政策，势必会重蹈南方根据地失败的覆辙。而就在中共中央正在准备研究国内国际各种新形势、检讨自己以往的种种策略的时候，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派遣秘密回到中国的张浩（林育英）来到了陕北苏区，从而使中共中央及时地了解到共产国际政策变动的情况。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包括以下几点：（1）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2）以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高表现形式；（3）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4）富农政策及相关政策应加以改变。同时，张浩带来莫斯科方面的口信：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指示和信息，都对中共中央和红军有极大的帮助。

西路军幸存者备忘录

秦维宪

